读史札记

康熙二十九年“亲往视师”再析

杨 珍

上个世纪 80 年代，孟昭信先生发表《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时间问题》一文。孟文指出，康熙帝为抗击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进犯，先后四次出塞，即二十九年（1690）七月进至博洛和屯（今河北隆化），三十五年春出师漠北，三十五年秋鄂尔多斯之行，三十六年春行兵宁夏。史称康熙帝三次亲征噶尔丹，上述四次应有一次不在其中。孟文认为第二、三、四次出塞为亲征，并通过考察清帝亲征的标志和康熙帝的言论，予以论证。同时，孟文还从史源学的角度，指出将二十九年康熙帝出塞看成亲征之说，来自魏源的《圣武记》。①

孟文已发表近三十年，但其论点似乎并未引起清史学界的充分重视。至今仍有相当多的论著，依然将二十九年七月康熙帝出塞，视为三征噶尔丹之首次；将三十五年二月出师漠北，视为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；将三十五年九月康熙帝的鄂尔多斯之行，排除在三次亲征之外；将三十六年二月行兵宁夏，视为第三次亲征噶尔丹。

康熙帝三次亲征噶尔丹，是清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。关于三次亲征时间的断定，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清廷征讨噶尔丹的决策及战略布署的考察和认识。关于康熙帝于三十五年春、三十五年秋、三十六年春三次亲征噶尔丹，很多论著已有详述。②本文试从梳理相关史料入手，发掘二十九年“亲往视师”前后若干重要史实，在此基础上，对孟昭信先生关于“乌兰布通之战不是亲征”之说略作补充。

一、亲征计划改变，抚远大将军福全于原定“驾发日”率清军主力启程

依据《亲征平定朔漠方略》，辅以《清圣祖实录》，并结合《张诚日记》、王士禛《居易录》等记载，可以大致看出，二十九年六七月间，在进击噶尔丹以及是否亲征的战略决策上，康熙帝曾有数次调整。

二十九年六月十九日，康熙帝接到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的奏报：厄鲁特兵当月初六日渡过乌尔会河，其兵号称四万，有俄罗斯使者率百许人至噶尔丹所；乌尔会河距喀尔喀河甚近，喀尔喀河

［收稿日期］2013－04－05

［作者简介］杨珍（1955—），女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；北京 100732；yz3024@163.com

① 见《清史研究通讯》1988 年第 3 期。魏源《圣武记》卷 3《康熙亲征噶尔丹记》，概述三次亲征出塞路线：“圣祖三驾亲征，其出塞一由东路，再由中路，三由西路。东路由博洛河屯，仅在盛京西界，因准夷已内越乌穆秦而南，故未度漠出边。”参见上册第 122 页，中华书局，1984 年。

② 参见孟昭信：《康熙帝全传》，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87 年，第 246—259 页；白新良：《康熙皇帝传》，百花文艺出版社，2007 年，第 283—293 页；黑龙：《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述论》，《卫拉特研究》（乌鲁木齐）2006 年第 4 期；黑龙、海纯良：《康熙帝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史实考》，《西部蒙古论坛》2010 年第 1 期；等等。

近喀伦仅一日程。① 对于清廷来说，这是噶尔丹欲行深入边内的一个信号。

此时供职清廷的法籍传教士张诚（Joannes Franciscus Gerbillon），在1690年7月25日（康熙二十九年六月二十日）的日记中写道："皇帝于昨晚下诏，派遣大军进讨厄鲁特人，又宣示圣驾拟于一个月内向彼方出巡，并顺道照常出猎。朝内的满汉文武官员，恳切要求随驾出征。"②

六月二十二日，定诸军起行日期。议政王大臣等奉命集议：诸王军（按，至是未言出征诸王人选）七月初四日起行，驾发日期初六日为宜。奏入，从之。

六月二十四日，乌珠穆沁额尔德尼贝勒博木布奏报，厄鲁特已至乌尔会河，于六月十四日在乌珠穆沁地方劫掠。据此，康熙帝认为军宜速出，并应增发官兵及火器。议政王大臣等遵旨议称：京城兵每佐领应增派护军二名，每旗护军参领一员。八旗火器营兵增发一千。所增发护军及火器营官兵，俱护驾而行。京城大兵陆续遣发，皇上亲统大军相机而行。奏入，从之。③

六月二十五日，以"上将出军"，先遣理藩院员外郎一员赍敕书往谕噶尔丹。这道敕谕内并未提及亲征一事。

六月二十九日，康熙帝接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等奏报，获悉当月二十一日清军于乌尔会河与噶尔丹军交锋败北。

清官修史籍对是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计五日内有关情况的记载，令人玩味：二十六日、二十七日，《平定朔漠方略》对战事无任何记述，《清圣祖实录》所记内容，与噶尔丹进扰事无关。二十八日、二十九日、三十日，两书均记载战事布署、调兵事宜，但未言及康熙帝"出军"。

两书所以未提亲征事宜，是因为至迟在六月三十日之前，康熙帝已决定改变原定出征计划。

六月三十日（1670年8月4日）张诚在日记中写道：

> 宗室觉罗、内廷大臣、六部九卿合词奏陈：圣驾不宜于此时亲临大军，或离开京师，以免引起百姓惊疑不安，特别是南方各省得悉圣躬驾出京师或以为时事有变，牵动大局。陛下俯允群臣所请，决定推迟亲征。他任命皇长兄为大将军，并令年仅十九岁的皇长子，代替自己参与这次征讨，以副皇上的心愿。④

众臣谏阻皇帝亲征，这在封建王朝时或有之，关键是看皇帝本人的态度。四十七年冬，康熙帝对大臣们回忆说："太皇太后在日，爱朕殊深。升遐以后，朕常形梦寐，奇异甚多。乌兰布通出兵之前，梦太皇太后止朕曰：'尔慎毋出兵，出恐无益'。后朕强行，果至半途抱疾而还。中路出兵之时，亦梦太皇太后谓朕曰：'尔此番出兵克奏大勋，但非尔亲获其俘耳。'朕彼时不能深解。后出兵，闻噶尔丹遁去，朕自拖诺山发兵往追，噶尔丹遂西奔，遇伯费扬古，大败之，多所俘获，始知梦兆符合如此。"⑤ 二十九年夏秋之际，康熙帝梦见太皇太后劝阻自己出兵，实则反映出当时康熙帝对于是否亲征，尚有犹豫。反之，三十五年出征前梦见太皇太后对此举予以首肯，表明此时康熙帝亲征之意坚定。⑥ 二十九年康熙帝一度对亲征与否举棋未定，这同其后乌兰

---

① 《平定朔漠方略》卷6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354册，第544、545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；《清圣祖实录》卷146，康熙二十九年六月戊寅，（台北）华文书局影印本，1964年。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）修讫的《平定朔漠方略》（一作《圣祖仁皇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》）与雍正九年（1731）修讫的《清圣祖实录》，均为编年体史籍。本文凡依据两书所述，均注明时间，除有记载相异处予以注明外，不另注出处。

② ［法］张诚：《张诚日记》，陈霞飞译，陈泽宪校，商务印书馆，1973年，第80页。

③ 《平定朔漠方略》卷6，第354册，第548、549页；《清圣祖实录》卷146，康熙二十九年六月癸未。

④ ［法］张诚：《张诚日记》，第81、82页。

⑤ 《清圣祖实录》卷235，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丁亥。

⑥ 三十五年（1696）春康熙帝亲征前，也曾遭到众臣阻谏。《清圣祖实录》卷287，康熙五十九年正月壬申，谕议政大臣等："中路出兵时，令大臣官员等会议进兵之处，众皆谓不可。独朕与费扬古以兵为可进，决意进兵。"

布通之役中清军未能歼灭噶尔丹，或有一定因果联系。

二十九年七月初一日，谕众臣："大兵陆续前进，朕亦亲往，姑勿与战，以待各路军至齐发，毋致失利。""亲往"与"亲统大军"，两者尚有区别。这应是康熙帝接纳群臣阻谏后所采取的折衷之策。

七月初二日，康熙帝命和硕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，皇长子允禔副之，出古北口；命和硕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，和硕简亲王雅布、多罗信郡王鄂扎副之，出喜峰口；命内大臣国舅佟国纲等十四人参赞军务。

七月初六日，即原定"驾发日期"，抚远大将军福全率清军主力启程。

二、罢安北大将军恭亲王常宁兵

七月初七日，康熙帝接内大臣苏尔达奏报，获悉所调科尔沁兵到者仅半，喀喇沁、阿巴垓等部兵均未到达预定地点，盛京兵亦未到。遂命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，"其恭亲王兵是否停止，一并议奏"。议政王大臣等议称："恭亲王且勿出，但令预备"。奏入，奉旨："恭亲王兵可勿备。余如所议。其令裕亲王及参赞大臣等知之。"①

两天后（七月初九日），康熙帝给内大臣国舅佟国维等人的上谕中，透露出"罢大将军恭亲王常宁兵"的主要原因：从前方奏报中获悉，"噶尔丹退回二宿之地，似欲潜逃"②。

张诚在1690年8月12日（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初八日）日记中所记，与《平定朔漠方略》等可相印证："厄鲁特国王已经退却的消息传来。皇上遂（定）于18日幸长城外鞑靼诸山围猎。"③

因噶尔丹有北遁迹象，康熙帝于七月初七日决定暂罢常宁兵后，又于七月初九日，命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统领精壮兵马先行，并授以方略：噶尔丹欲逃，即行追击，若彼来战，乃行羁縻之计，以待大兵。

三、康熙帝以"靖喀尔喀之肆"为名亲往视师，旋即中暑

七月十三日，康熙帝接福全奏报，悉噶尔丹军内进至奇尔萨布喇克之地，其地近阴山，与盛京、乌喇、科尔沁调兵处不相涉，盖稍在内矣。遂令各路兵齐集巴林，"前所发五旗每佐领护军二名，令恭亲王领之，逾二日启行"④。此次恭亲王常宁所领之兵，似为六月二十四日议政王大臣遵旨所议，原拟护驾而行的京城每佐领所增护军二名。

七月十四日黎明，康熙帝启程前往塞外，"抚慰北边外蒙古"⑤。是日寅刻，百官跪送于紫禁城东华门。十二天前（七月初二日）曾被任命为常宁军副帅之一的简亲王雅布，扈从康熙帝而行。寻谕镶黄旗满洲都统、议政大臣瓦代等：据奏报，噶尔丹于六月二十七日潜师北去，"朕之欲幸此军者，以躬近行间便指示也。今噶尔丹虽退而喀尔喀方且横行，劫掠驿递及诸扎萨克马畜

---

① 《平定朔漠方略》卷7，第354册，第560页；《清圣祖实录》卷147，康熙二十九年七月丙申。

② 《平定朔漠方略》卷7，第354册，第560页；《清圣祖实录》卷147，康熙二十九年七月戊戌。［苏］伊·亚·兹拉特金：《准噶尔汗国史》（1635—1758）指出："乌尔会河得胜之后过了几天，噶尔丹开始撤回。满洲和俄国的文件都提到了他的撤退。我们无法确切说明这次撤军的直接原因。"参见第277页，第277—280页，马曼丽译，商务印书馆，1980年。

③ ［法］张诚：《张诚日记》，第83页。

④ 《平定朔漠方略》卷7，第354册，第563、564页；《清圣祖实录》卷147，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壬寅。

⑤ 台北故宫博物院：《清代起居注册·康熙朝》第1册，第396、397页，（台北）联经出版社，2009年。《清圣祖实录》卷147，康熙二十九年七月癸卯（十四日）条则称"上巡幸边塞"。

衣服。乘此大兵集会，朕乃亲往视师，以靖喀尔喀之肆，俾知所畏忌，事可一举而定也”①。所谓噶尔丹北去，已是过时的情报。康熙帝所以“亲往视师”，乃因得知噶尔丹复内进矣。他告知随行的议政大臣，此行目的是解决喀尔喀的肆行劫掠，或许在他看来，既以皇兄福全为出征统帅，此行并不属于亲征。

七月十六日，常宁率军继行。② 曾于七月初二日被任命为常宁军另一副帅的信郡王鄂札，奉命留守京师。③

常宁启程当日，康熙帝出古北口，驻跸鞍匠屯，中暑。④ 翌日，力疾前进，七月十七、十八、十九三天，驻跸正红旗鹰庄。十九日，命常宁率师自鞍匠屯取道兴州，趋正蓝旗游牧之地，往会福全军（七月下旬抵福全处）。二十日，康熙帝驻跸青城（即喀喇和屯，今河北省承德市西南滦河镇）。⑤ 病情似有加重，自忖难以继行，遂命简亲王雅布赴福全军前参赞军务。二十一日，随扈诸臣以“圣躬违和”奏请回銮。因驻跸地青城昼热夜寒，不利调摄，二十三日，康熙帝决定暂且回銮。谕扈从诸臣侍卫等：“朕来此地，本欲克期剿灭噶尔丹，以清沙漠。今以朕躬抱疾，实难支撑，不获亲灭此贼，甚为可恨。”⑥ 言至此，不禁叹息流涕。命选择肥壮马匹分给随驾火器营兵、前锋护军，令驰赴福全军前。然而康熙帝仍心有不甘。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日三天，留驻（喀喇河屯以北）正红旗鹰庄，欲俟好转，继续前行。二十五日，皇太子允礽、皇三子允祉自京师驰至问安。无奈在此期间，康熙帝的病情又有反复。二十七日，随扈众臣再次叩请回京调理。康熙帝决定缓辔途还，当日踏上归途。

七月二十九日，康熙帝驻跸鞍匠屯。八月初一日，驻跸三岔口。命皇太子允礽先回京师，“以杜绝因圣躬违和而发生的谣言蜚语”⑦。旋接抚远大将军福全捷书，内称清军击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。初七日，康熙帝抵京。

综上，因噶尔丹军侵扰乌珠穆沁诸地，二十九年六月下旬，康熙帝拟亲统清军出征。由于群臣坚阻皇帝亲征，加之噶尔丹军有北遁迹象，康熙帝决定暂缓亲征，实则对是否亲征未下决断。七月初六日，遣裕亲王福全、皇长子允禔代行征讨。未几，复闻噶尔丹军内进。七月十四日，康熙帝起程赴塞外，旨在躬近行间，指挥调度，围迁噶尔丹军。十六日即康熙帝离京第三日，即中暑。勉强行至正红旗鹰庄，延滞数日，病情反复，于是缓行回京。

福全出征后，康熙帝始终与他保持密切联系，频频指示机宜。清军渐入临战状态，康熙帝虽在病中，总揽全局，调兵点将。

另一不应忽视的情况是：二十九年七月初六日，只是抚远大将军福全率清军主力出征，安北大将军常宁并未出征。不久，康熙帝根据敌情变化，暂罢常宁兵。七月十六日，即康熙帝“巡幸边塞”的第三天，常宁方奉命率领原拟护驾的部分清军离京，往会福全军。常宁军所行路线，

---

① 《平定朔漠方略》卷7，第354册，第564页；《清圣祖实录》卷147，康熙二十九年七月癸卯。

② 王士禛：《居易录》卷7，《王士禛全集》第5册，齐鲁书社，2007年，第3812页。作者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使，充经筵讲官。

③ 康熙二十九年十一月下旬，福全等率军还京师，止宿城外听勘。奉旨取供议罪的大臣，以多罗信郡王鄂扎（一作俄扎）居首。参见《平定朔漠方略》卷8，第354册，第588、589页；《清圣祖实录》卷149，康熙二十九年十一月己酉。

④ 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）七月初三日立秋，七月十九日处暑。

⑤ 《清圣祖实录》卷147，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己酉条称是日（七月二十日）“上驻跸博洛和屯”。

⑥ 《清圣祖实录》卷147，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壬子。《平定朔漠方略》、《清代起居注·康熙朝》中均无此记载。

⑦ ［法］张诚：《张诚日记》，第83页。关于康熙帝让皇太子允礽先行返京的原因，另有不同记载。一说允礽见到病中的皇父，并无关切之意，康熙帝不快，令返京师；一说允礽的侍从“对皇上病危不够悲痛，甚至流露一些喜色”。分见《清圣祖实录》卷147，康熙二十九年七月癸丑；［法］白晋：《康熙帝传》，马绪祥译，《清史资料》第1辑，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234页。

亦非原定之“出喜峰口”。

四、时人对康熙帝三次亲征时间的认定

关于康熙三十五年春、三十五秋、三十六年春康熙帝三征噶尔丹，除去孟文所述康熙帝本人的三次言论外，康熙朝人记述中相关例证还有较多。仅择数例如下。

其一。《康熙起居注册》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记毕，起居注官称：“外藩厄鲁特、喀尔喀素奉朝贡，近因二国构衅相攻，谕令修睦，噶尔丹外饰顺从，中怀狡诈。爰烦王师，指授方略，决胜于数千里之外，彼皆望风奔溃，此又神武之无远弗届者也。”①这是清官修史籍对二十九年康熙帝出塞并非亲征的最早记述。

与此截然不同，关于三十五年春康熙帝出师漠北、同年秋鄂尔多斯之行、三十六年二月亲临宁夏等三次出塞，《康熙起居注册》在三十五年末、三十六年末所作评述中，分别称之为“决计亲征”、“复亲征塞外”、“亲举六师……功倍三捷”。②

其二。《出师塞北纪程》的作者，曾亲历乌兰布通之战。此文内称，康熙二十九年，“绥远大将军裕亲王杖□专征，出东道古北口”③。

按，如果作者认为是年康熙帝出塞乃是亲征，不会记有裕亲王福全“杖□专征”之语。

其三。四十七年七月初九日，康熙帝撰《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》。内称：

> 噶尔丹……忽阑入我乌阑布通之地，朕受钺亲王大臣，问罪声讨。大师克捷，未即殄除。……朕深念此寇断宜速灭，于是整饬士马，备峙粮糗，决策亲征。……噶尔丹仅以数人跳身走，嗣是朕再驾而至鄂尔多斯，三驾而至狼居胥山麓。……二十余年狡悍陆梁之劲寇，曾不二载，悉皆草薙禽狝而大业克就矣。④

康熙帝在此明确指出，二十九年乌兰布通之战乃“受钺亲王大臣，问罪声讨”。既未提及是年七月他本人出塞，自然就将此行排除在三征噶尔丹之外了。⑤

其四。三十六年夏，康熙帝即将结束第三次亲征返京之际，詹事府左春坊杨大鹤撰《皇清睿略神功定万世太平颂》。《序》云：

> （噶尔丹）与喀尔喀交相仇杀，乃敢阑入近地。皇上命将出师，大败之于乌兰布通，惩艾而去，谕以内附，昏迷不悛……皇上……赫然震怒，自将六师以征之，阅岁再春，三临塞外，渠魁陨毙，荒徼永宁。⑥

杨序明确指出乌兰布通之战乃“命将出师”，并未与皇帝“自将六师”，“三临塞外”混同一谈。

---

① 台北故宫博物院：《清代起居注册·康熙朝》第1册，第585页。

② 台北故宫博物院：《清代起居注册·康熙朝》第9册，第4853、4857—4858页；第11册，6175—6178页。

③ 张宸：《平圃遗稿》卷14，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第5辑，北京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29册，第763页。

④ 《圣祖仁皇帝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354册，第425—426页。冠于《平定朔漠方略》之首的《圣祖仁皇帝御制亲征朔漠纪略》，主要进述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亲征噶尔丹的经过，对乌兰布通之战及三十五年九月、三十六年二月的两次亲征，概未提及。参见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354册，第436—452页。

⑤ 康熙六十一年九月，谕议政大臣等：“……前噶尔丹攻破喀尔喀，并侵扰我内地扎萨克至乌兰布通，朕亲统大兵征讨，噶尔丹败走。后又侵犯克鲁伦，朕统兵三路并进，至昭莫多剿灭之。”参见《清圣祖实录》卷299，康熙六十一年九月乙酉。这时距其撰写《平定朔漠方略》序文已逾14年，距其去世（六十一年十一月）仅两月余。此言乃对当朝数次征讨噶尔丹之战统而言之，不宜据此认为，康熙帝称二十九年出塞是三次亲征噶尔丹之首次。参见前引孟昭信文。

⑥ 陈廷敬等编、张廷玉等续编：《皇清文颖》卷34，第23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。

其五。康熙三十六年秋升任礼部右侍郎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韩菼，同年作《圣德神功告成大庆颂》。《序》云：

> 皇帝……甫二载三临绝漠而大告武成。先是师之初出也，大破厄鲁特于昭木多之地。……乃于九月复发京师，渡河至鄂尔多斯，申布天威。……三十六年二月，车驾复发京师，次大同。……（噶尔丹）乃于闰三月癸巳仰药死，厄鲁特亡。①

其六。康熙三十七年冬，流放盛京的原翰林院编修陈梦雷，闻知康熙帝东巡，遂面呈《圣德神功恭记七言排律一百二十韵》，得赏识，赦还京师。内云："北国喀尔喀慕义内附而厄鲁忒恃其荒远，修怨凭陵。……命将出师，尚未授首。我皇上……以为将士远征，逾漠涉险，遥禀睿谟，则兵机或缓，亲加拊循，则士锐益奋，于三十五年赫然躬行天讨……连岁三度出边，睿筹既周，渠魁斯殄。"②

综上，无论是康熙帝，还是参与乌兰布通之战的清军将领，以及康熙朝史官、朝臣、流放关外的罪罪大臣，众人一致认为：二十九年乌兰布通之战乃命将出师，惟三十五年二月、三十五年九月、三十六年二月康熙帝三次出边，是其亲征噶尔丹。

不妨再看看乾隆时期清廷有关看法。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七月，《四库全书》总纂官纪昀等"恭校"《平定朔漠方略》后所写按语，并未提及乌兰布通之战。内称：

> 盖噶尔丹凶顽爽誓，寖为边患，乃于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亲统六师往征之。贼众骇遁，噶尔丹仅以身免，大军凯旋。是年九月再幸塞北，谕噶尔丹以束身归罪，并纳其所属之归降者。迨明年二月，复统大军亲征，噶尔丹旋伏冥诛，余众悉降。于是廓清沙漠，辑定边陲，为万古无前之伟绩。③

时距乌兰布通之战和康熙帝三征噶尔丹，已逾八十余载。与康熙年间相较，乾隆朝廷对康熙帝三次亲征噶尔丹时间的认定，并无变化。

五、结语

魏源的《圣武记》，成书于道光朝后期，时距乌兰布通之战及康熙帝三征噶尔丹，已有约一个半世纪。④ 将康熙二十九年秋清帝出塞视之为三驾亲征噶尔丹的首次，或是由于间隔雍、乾、嘉数朝，当事人早已无存，而作者未能尽用第一手史料，因此造成所述史实失真的事例之一。

关于康熙二十九年"亲往视师"是否为康熙帝首次亲征噶尔丹的讨论，含有治史中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，即如何取舍不同时期形成、记述同一事件的各类史料。在进行比较、分析的基础上，尽可能地依据形成时间距考察对象相对较近的史料，或许更有助于揭示历史的真实。此外，某一历史事件的当事人、参与者以其同朝、同时代人对于这一事件的认识或看法，也是我们应当予以重视的。

---

① 陈廷敬等编、张廷玉等续编：《皇清文颖》卷34，第32、33页。关于噶尔丹的死因有不同说法，参见崔岩：《噶尔丹死亡问题考辨》，《清史研究》2007年第1期；除去杨大鹤、韩菼外，为康熙帝三征噶尔丹作颂辞的当朝大臣还应有其他人。

② 陈梦雷：《松鹤山房文集》卷1《三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疏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，第1416册，第18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③ 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354册，第435—436页。

④ 魏源此说或对晚清乃至民国初年的清史著述产生了较大影响。如成书于光绪年间的王之春《清朝柔远记》云：康熙二十九年，秋七月，"诏亲征噶尔丹"。参见卷2，第40页，中华书局，1980年。又如完稿于1927年的《清史稿·圣祖本纪》云：康熙二十九年七月癸卯，"上亲征，发京师"。参见卷7，第2册，第230页，中华书局标点本。两书均未将三十五年秋康熙帝的鄂尔多斯之行，视之为亲征。